

# 歷史中的政治與行進中的政治

## ——評李侃如的《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

● 楊志軍

《治理中國》主要從綿延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制度縷析入手，着重探討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歷程，最後着眼於當下複雜的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現實，提出頗富創見的轉型目標及策略。



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 著，胡國成、趙梅譯：《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治理」是一個集理念、過程和目標三者並重的概念。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 作為美國最傑出的中國觀察家之一，其《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以下簡稱《治理中國》，引用只註頁碼) 一書，契始於近現代

歷史中的中國政治，着力於當代中國政治現實，期冀探尋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為中國大陸史學界、政治學界呈現出一個真實流動而又詭秘演進的中國政治世界。書中主要從綿延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制度縷析入手，着重探討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歷程，最後着眼於當下複雜的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現實，提出頗富創見的轉型目標及策略。本文主要從五個方面對此展開詳細述評。

### 一 如何理解真正的中國政治

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專制時代的中國一直都在「歷史周期律」中搖擺迴圈，改革時代的中國則是首先採取大膽的行動，然後努力去適應其結果並盡力繼續前進。中國專制王朝政治的最大特徵，就是皇帝作為官方儒家意識形態的傳播者和國家統治的最高權威，不受任何正式的法令規章制度約束。其間充斥着皇帝與政府官僚機構、內廷與外朝、忠臣與奸臣等緊張關係，同樣也充滿了政治權術、軍事陰謀、官僚墮落和社會動蕩。這種制度始終

## 二 清朝帝制的沒落與 中國共產黨的崛起

無法解決具有克里斯瑪型權威的強勢領導者和尋求提升自身特權、並要求確保穩定和繁榮的強勢行政官僚機構之間的矛盾，當然也無法擺脫農民起義的厄運。

李侃如將大多數朝代衰落的因素總結為：內部腐敗、政府機構紀律鬆弛、社會動亂四處蔓延、意識形態銳氣消沉、皇親國戚勢力膨脹、軟弱無能的皇帝繼位、軍人相對文官的地位上升。凡此種種，帶來了嚴重的問題，挑戰者遲早會聚集起充分的力量來推翻朝廷；而後可能經過幾年或是幾十年的內亂與空位時期，最終改朝換代(頁23)。由於這些病症如此頑固，它們總是會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出現在每一個歷史時代。

李侃如在書中從傳統社會、近代社會和現代社會三個層次來逐級剝解中國政治的演變軌迹，沿着從革命到改革的歷史主軸，執著於追求中國政治的真實面目，試圖揭開治理中國的道理。但我們必須認識到，由於中國超大的社會規模、國家內部管理活動的極端複雜性，以及傳統文化和歷史感的厚重三大要素，任何一個達致有效的決策活動，在執行過程中都將深深掣肘於傳統慣性和現代性的張力，中國政治在歷經朝代迴圈與動蕩不安的近現代史後，還是必須回歸到現代政治分析的框架中來重新進行認識。從某種意義上講，歷史與政治具有天然的聯姻關係，一切當代政治活動都將成為刻錄在水墨粉鉛字迹和鑲嵌在國人記憶深處的過往歷史。民主政治時代的使命就是充分運用政治手段來促進人類進步和文明的發展，在躍向未來的賽跑中，窮國和富國都不能離開創造性的政治活動。

清王朝正式結束於1912年2月12日，這也標誌着中國兩千多年帝制統治的結束。對於清王朝衰落的原因，李侃如如此理解：「一是直到十九世紀90年代，造成王朝衰落的傳統因素如孱弱的皇帝繼位、普遍的腐敗、頻仍的水災和地方暴動一直存在並佔了上風，結果導致了清廷的虛弱；二是工業化的西方和日本的影響，它使中國面對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需求和由此導致的種種危機。」(頁21)另外一種具有內在邏輯推導性的解釋是：「中國官員覺察到一個具體的問題，於是做出自認為尚能應付的最低限度的回應，而後便遭遇到兩種困難：一是他們的措施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後果，出現了新的問題；二是這些措施不足以應對最初的挑戰。整個問題滾雪球似地從外圍發展到核心，最終撼動了王朝及王朝體制自身。」(頁24)

不管作何解釋，清朝帝制的沒落可歸結為四個字：內憂外患。在內憂方面，清王朝恰是在勃興時期出現和坤式的巨大腐敗，晚清時期用以籌措資金的大規模的賣官鬻爵，雖為李鴻章用作正途但卻作了歪解，皇帝的孱弱肇始於咸豐皇帝聽聞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而暴斃於承德避暑山莊。民眾在無法抗禦的自然災害和社會經濟動蕩面前，最好的選擇除了默默承受以外，就是揭竿而起。十九世紀中期連續交替出現過四次大的起義：太平天國運動(1850-1864)、捻軍起義(1853-1868)、西南回教起義(1855-1873)、西北回民起義(1862-1878)(頁22)。

李侃如從傳統社會、近代社會和現代社會三個層次來逐級剝解中國政治的演變軌迹，沿着從革命到改革的歷史主軸，執著於追求中國政治的真實面目，試圖揭開治理中國的道理。

中國共產黨動員社會各階層力量共同反抗國民黨專制政權的各種方式，總是在關鍵時候取得成功。正如李侃如所說，無論他們提出甚麼號召，無論他們號召的群體是甚麼，也無論政治運動在哪裏發生，他們都是成功的。

儘管每次起義都有不同的原因和特徵，影響力和規模也不等，但加總起來已經動搖了帝國的根基。

在外患方面，兩次鴉片戰爭的失利、甲午海戰的失敗、八國聯軍侵華的恥辱，都深深烙在當權者和國民心中。尤其是日本在1894至1895年甲午戰爭中的決定性勝利，遠比西方此前對中國所做的任何事情更加震撼中國。中國文人和官員將其滿腔怨憤直指清朝統治者，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一批革命政治精英開始奮起挑戰整個清朝統治制度。本已搖搖欲墜的清王朝終於沒能堅持多久，在革命之勢燎原和體制內力量分崩離析的困境中徹底墜落。在此過程中，不論是革命者還是效忠清朝的人，都希望實現所有中國人共有的目標：使中國在西方和日益強大的日本的帝國主義時代富強起來。

隨後，在種種難以釐清的不同勢力和派系中，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脫穎而出，自1920年代中期起，兩大政黨主導了中國政治舞台。尤其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使中國共產黨由弱變強，迅速走上歷史前台，開始了從崛起到奪權的曲折道路。在這條曲折的道路上，中國共產黨動員社會各階層力量共同反抗國民黨專制政權的各種方式，總是在關鍵時候取得成功。正如李侃如所說，「無論他們提出甚麼號召」，「無論他們號召的群體是甚麼」，「也無論政治運動在哪裏發生」，「他們都是成功的」（頁60）。中國共產黨通過機智地運用政治動員來支持游擊戰和運動戰，從而打敗了國民黨；國民黨失敗的主要原因則在於日本的入侵和內部嚴重的腐敗與派系鬥爭。

總之，中國共產黨取得成功的關鍵在於找到了一種唯一可以取代國民黨統治的方法，同時也造就了黨的偉大特性。例如毛澤東自從1935年遵義會議之後就在黨內取得了無可爭議的地位；黨牢牢掌控了革命的核心力量——軍隊；延安根據地治理的一系列經驗。更為重要的是，1949年以前的經歷使得領導層確信，意志與戰略的正確結合可以戰勝看似不可克服的客觀困難，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樣艱苦卓絕的環境中探尋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真理。

### 三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改革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宣告成立，從此開啟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追求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強國的歷程。李侃如將毛時代劃分為六個階段：一、經濟和政治恢復以及基本的社會主義改造時期（1949-1956）；二、否定與反思蘇聯模式（1956-1957）；三、大躍進（1958-1961）；四、恢復與精英分歧加劇（1962-1965）；五、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階段（1966-1969）；六、文化大革命後期和接班人問題上的鬥爭（1970-1976）（頁95-96）。

建國伊始，國家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創建政治制度，實現經濟恢復和增長，進行革命性的社會變革，並在國際舞台上站穩腳跟。主要做法是通過「運動治國」的理念發起一連串的群眾運動，這些運動在短期內大幅改變了中國農民和城市居民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例如，始於1950年6月的土地改革使

農民受益，並在農村建立了共產黨的政權結構；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運動以及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削弱了城市的社會力量；農業合作化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城市和農村經濟。事實上，這種廣泛動員群眾的戰略，在本質上更適合於黨和軍隊的機構而不是政府機構去實施，與正常工業化的發展戰略和宗旨背道而馳，一旦將之擴大化和持續化，將會給國家帶來深重的災難。

緊接着發生了下列事情：農民出身的黨的領導幹部和知識份子之間形成的緊張關係直接導致了1957年反右運動的爆發；1958年，大躍進一觸即發。大躍進背後的基本理念是：通過整個社會集中在幾年的時間裏付出超常的努力，中國就能夠跨越正常的經濟發展階段。這個理念是基於如下想法：群眾中蘊含着巨大的生產潛力，通過組織和努力，就能把他們的勞動轉化為資本(頁114)。大躍進運動沒有維持多久，人民公社中出現的激進行為和虛報產量蔚然成風，整個體制在一種無節制的動員和近似烏托邦式的狂熱個人崇拜中運轉失控，結果中國部分農村陷入了大饑荒，終致釀成全國性的悲劇。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對大躍進運動所產生的嚴重後果承擔了責任，但仍認為成績與缺點是七個指頭與三個指頭的關係，而劉少奇則認為造成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並為彭德懷說話。從大躍進災難中，毛得出「群眾運動在帶來價值觀變革方面有重要作用」的偏執觀點，最終導致了十年文革浩劫。毛宣導的革命和建設運動是在意識形態掛帥的旗幟下，

堅持群眾路線和政治運動戰略，牢牢把握階級鬥爭的主旋律，宣導財富分配和社會地位的平均主義，從而得以在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內環境和世界局勢此起彼伏的國際環境中建立起了一個強大的國家形象。然而，治理與革命是相互對立的。政府的管理只有在在一種允許制訂長期計劃、並擁有願意為共同目標奮鬥的優秀人才的環境中才能最有效地運行。很簡單的道理是，革命者傾向於把複雜的管理看作實現其目標的障礙，而穩定有序和優秀的行政機構則常常要對革命者決策衝動中的熱情和缺乏技術專長潑涼水。

痛定思痛，1970年代末，在鄧小平的支持下，中國開始了迄今為止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推行過的影響最深遠、最為系統的改革。改革開放時期的總體趨勢，已經從毛時代的經濟孤立主義轉變為要求參與國際市場，並將其龐大的剩餘勞動力供應與外國投資結合在一起，以支撐國家的經濟增長。中央計劃體制讓位於指導性計劃，這種指導性計劃又反過來服從於商品和服務的市場配置。政府的經濟改革序列為：農業→財政制度→對外貿易與投資→計劃體系→價格機制→金融銀行系統。這些改革措施交互作用，相互影響，下放了政治權力，實現了資訊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獲得了由市場決定的經濟效益和技術動力所必需的價格和競爭，充分利用了在國際經濟分工中勞動力便宜的競爭優勢，加強並改變了經濟和社會的運轉方式。

這一時期的基本經驗有兩條：第一，政黨具有在不徹底改變既有制度安排的前提下引入一系列變通性制度安排的能力，在以試錯方式

毛宣導的革命和建設運動是在意識形態掛帥的旗幟下進行的。然而，治理與革命是相互對立的。政府的管理只有在在一種允許制訂長期計劃、並擁有願意為共同目標奮鬥的優秀人才的環境中才能最有效地運行。

引入變通性制度安排並形成新制度的基礎上，不斷揚棄舊制度。具體的變通方式有：重新定義政策概念邊界；調整制度安排的組合結構；利用制度約束的空白點；打政策的擦邊球等。第二，市場導向的某些改革措施與決策權下放給基層的做法結合在一起，在中國大多數地區產生了強大的推動力，推進以短期經濟增長為目標的政策（頁254）。

#### 四 重大挑戰與政治轉型

進入二十一世紀，在「經濟繁榮黃金期」和「社會矛盾突顯期」共存的現實條件下，中國社會所面臨的挑戰是全方位的。

在經濟方面，追求經濟改革所採取的戰略本身就是一柄雙刃劍，在改革時代，領導人引領和構築改革要得到官員和民眾的「特定性支援」與「散布性支持」<sup>①</sup>，就不得不採取分權化的戰略決定和措施。但是，這種分權化的經濟刺激戰略至少造成了下列三個方面的重要影響：第一，官員對經濟決策擁有的巨大權力為尋租性的腐敗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第二，強調本地經濟增長最大化成為中央與地方政治「錦標賽體制」<sup>②</sup>的重要表現，導致中央協調地方性的特殊優惠政策安排難度加大，區域間的協調發展成為一種現實窘境；第三，國有企業改革陷入停滯狀態，「軟預算約束」<sup>③</sup>成為學界擔憂和政府無法破解的難題。

在環境影響方面，中國當前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是環境品質的下降。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WHO）所披露的一系列資料足以

顯示中國環境問題的嚴峻性，可以說，現在中國比今天的工業化國家在其經濟發展的可比階段上，面臨着更加廣泛的環境惡化問題。因此，強調現在不注意環境問題、未來中國將付出巨大代價的悲觀論調絕不是危言聳聽。就目前的情形來看，水資源短缺和空氣污染是環境問題的兩個主要方面。除了將環境保護局升格為「國家環境保護部」外，中國政府還着手修建「南水北調工程」來解決。但是，來自下層的嚴酷現實並未達到將環保議題提上國家議程的程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追求經濟高速增長上的緊密聯繫，依然制約着中國對環境問題的有力應對。

在國家和社會的關係方面，改革以前，「社會」更多的是國家行動的目標，而較少成為影響國家的思想和動機的源泉。改革時代，國家無力再為民眾提供統一的道德指南；同時，精英結盟日益成為社會現實，財富不均和精英集團的內部通婚大量存在。因此，下述三個問題較為嚴峻：第一，未來中國國家和社會的關係將遵循何種路徑演變？「弱政府—強社會」抑或「強政府—強社會」，哪種更具可能性，更有優勢？第二，在社會中將產生甚麼樣的階級結構和階級意識？農民工是否一定會成為農民階級與工人階級融合的替代形式？第三，中國社會能否培育出一種與「小康社會」保持一致的有意義的價值觀共識？這種指導人們行為的基本道德準則應該怎樣建構？

不僅如此，一些尚未或者無法改變的體制卻仍然存在並深刻影響着現政權，例如，改革前的黨政結

改革以前，「社會」更多的是國家行動的目標，而較少成為影響國家的思想和動機的源泉。改革時代，國家無力再為民眾提供統一的道德指南；同時，精英結盟日益成為社會現實，財富不均和精英集團的內部通婚大量存在。

構在國家機構所有層次上的複製，產生了一個不適應現代政府管理理念和模式的縱向和橫向權力的、極其複雜的矩陣結構。這種矩陣結構混亂的根源是「職責同構」，形式表現為「條塊關係(分割)」④，面臨着潛在的嚴重問題。中央與地方在放權和穩定關係的博弈過程中所達成的「全國性的政治契約」(頁334)已經使經濟成就成了評判地方黨政官員表現的重要標準，鄉鎮和縣級以及市級官員具有高度的企業家精神，但是缺乏「共同願景」。

在公共衛生安全方面，2003年「非典」(SARS)的傳播暴露出農村公共衛生系統基礎設施的脆弱性。農民、農民工在城鄉和區域之間頻繁流動，更是在農村健康問題與城市健康問題之間建立起了潛在的危險聯繫，一旦遇有大型疫情，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和社會成員的心理壓力及輿論恐慌等因素的閾值將難以承受。另外，三個主要地區——新疆、西藏和台灣——的政治問題，不僅是國內問題，而且也是嚴肅的跨國政治問題的組成部分。前兩者已經在近兩年先後爆發政治社會危機，充分顯示了國內邊疆政治穩定問題的嚴肅性和緊迫性。

面對未來，福山(Francis Fukuyama)認為：自由民主制度也許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並因此構成「歷史的終結」⑤。他進一步解釋道，歷史終結並不是說生老病死這一自然迴圈會終結，也不是說重大事件不會再發生了或者報導重大事件的報紙從此銷聲匿迹了，確切地講，它是指構成歷史的最基本的原則和制度可能不再進步了，原因

在於所有真正的大問題都已經得到了解決⑥。我們可以按照多數政治學家的理解，將「歷史終結論」直觀地解釋為：當一個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達到一定水準之後，非民主的政體就很難維繫，而且民主化轉型一旦發生也很難逆轉⑦。如果以國際上通行的美元購買力平價(PPP)為基準設定6,000美元作為福山理論之有效性最為明確、最具經驗可測性的標準，對於中國來說意味着甚麼？如果說面對「中國模式」的歷史終結論是否失靈是福山的問題，那麼我們關切的問題則是：面對歷史終結論的中國道路是否能夠成功？

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上的輝煌成就並不能帶來政治上的完美和一致的解釋。王紹光對冠在中國政治頭上的「威權主義」帽子十分不滿：「在過去幾十年裏，這個標籤像狗皮膏藥一樣往往被隨處亂貼。中國政治在此期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貼在中國政治上的標籤卻一成不變。如此荒唐的概念與其說是學術分析工具，不如說是意識形態的詛咒。現在已經到了徹底擺脫這類夢囈的時候了。」⑧李侃如認為「中國領導人現在看到了其社會的日益活躍和分化。他們的基本應對措施是對黨的結構和政治程序做出調整，以理解社會和經濟需求，並對它們做出有效的反應。」(頁340)他非常重視「中國特色」，並用「勢如騎虎」來形容目前的形勢：「光明的前景可以使中國扮演一個極其重要的建設性角色，鞏固它的地位，並結束其長期的傷痛，恢復它在十九世紀的衰落中所失去的尊嚴。但是，各種極其不利的潛在結果也是

李侃如認為中國領導人現在看到了社會的日益活躍和分化。他們的基本應對措施是對黨的結構和政治程序做出調整。李侃如非常重視「中國特色」，並用「勢如騎虎」來形容目前的形勢。

全書基於歷史事實、公開資料和國別知識，做到立場中立實屬難能可貴。李侃如帶着憂思的情緒和負責任的心態，提出諸如「有選擇的現代化論者」、「反傳統的現代化論者」，以及「精英權力主義的民族主義體制」等概念，均具有創新性。

可能的。總之，這隻老虎尚未被馴服。」(頁356)

## 五 該書特色與值得商榷之處

總體看來，《治理中國》具有四個方面的主要特點：

一、結構嚴謹，邏輯性強。全書共有十一章，由四部分組成，歷史跨度由清朝、近代、現代到當代中國。四部分內容儼然一幅描繪中國政治的歷史畫卷，徐徐展開，環環相扣，層次分明，幾乎每一章都能看到作者精心編排的印記，尤其是第四章和第六章表現得最為明顯。例如第四章不同於國內教科書，將毛澤東時代(1949-1976)細分為六個階段；第六章縱向且深入地對建國以來中國政權的組織結構和運轉技巧等方面作了論述。

二、簡練清爽的宏大敘事。本書採用了歷史比較的方法來研究政治問題，縱向講的是歷史，但實質上分析的是中國政治。一般來看，這樣的著作很難擺脫繁瑣的史實堆積和乾癟政治術語的充斥，但《治理中國》做到了敘述和分析的完美結合。

三、立場客觀公允，某些觀點具有啟發性和前瞻性。全書基於歷史事實、公開資料和國別知識，自始至終都沒有流露出偏激的情緒，作為一個國外學者能對中國問題做到立場中立實屬難能可貴。另外，李侃如帶着憂思的情緒和負責任的心態，提出諸如「有選擇的現代化論者」、「反傳統的現代化論者」(頁27)，以及「精英權力主義的民族主義體制」等概念(頁354)，均具有創新性。

四、語言生動流暢，翻譯上乘。李侃如的思維方式是美國式的，而該書的寫作對象是美國大學生。但是，我們從書中絲毫讀不到晦澀難懂或者脫離中國國情和文化特點的生硬語言，在每章的導言和結論部分尤能感受文字的魅力和翻譯的功底。

當然，學術研究中的問題關注永遠沒有終點，也沒有最好。《治理中國》至少在以下方面值得探討。

首先，書名《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是否能夠準確地反映全書的內容？很顯然，作者是從歷史的角度審視與考察中國政治，寄希望於通過當代中國的改革行動塑造歷史，影響未來。但是，不容忽視的是，清王朝在面臨內外交困的局面下，一大批改革派大臣也曾殫心竭慮地為挽救大清衰落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甚至在後期也進行了「百日維新」的變法行動，書中對此隻字未提。民國初年，一批軍閥也在各自的勢力範圍內尋求自治，曾嘗試進行改革並推動工業發展；蔣介石國民政府統治時期一直都在致力於發展國民經濟，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諸多領域進行了大膽的改革行動。正如書中〈前言〉所說，「變得越多，留存越多」(〈前言〉，頁5)，歷史是高度濃縮的政治，今時今日的改革行動不可避免地會打上往昔的印迹。如果按照「從革命到改革」的治理邏輯，全書需要使用更為合理的結構安排。

其次，全書從第五章開始，佔用了將近三分之二的篇幅，詳盡地闡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全方位的治理實踐，構建了一個龐大的分析框架，試圖達到作者在〈中文版

序言》中所揭示的「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心理暗示和預期目的。但事實上，作者對一些關鍵問題的解釋明顯不夠，在具有開創性的觀點提煉方面隨意性較強。例如，在談到經濟改革所帶來的後果和影響時，李侃如認為中國目前「發展了一種『談判』經濟，而不是一種市場經濟」（頁272）。『談判』經濟固然是一個不錯的名詞，但是這樣的論斷從何而來？其演變是否具有階段性？影響又如何？又如，在第十章談到了許多人爭辯的一個問題，即「中國人是否比其他大多數國家的人更怕亂」（頁306），隨後又引用蘇黛瑞 (Dorothy J. Solinger) 和李靜君的研究給出了正反例證。由此可見，對於此類政治文化上的經驗主義命題，其證實或者證偽都是見仁見智，極具研究空間，極富研究啟示，但作者只是輕易地引出，卻未能作出有說服力的引導性和拓展性回答。

再次，如何看待中國政治文化差別中的經驗主義是一個很值得去深究的問題，但作者並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也沒有作出自己的解讀。又如，在談到中國地方政府可能扮演的角色時，李侃如作了五種角色的總結（頁339）。然而，要繼續追問的是：地方政府為甚麼會扮演這些交錯的角色？迄今為止，有沒有一種適當的理論框架來解釋中央與地方之間所形成的多層次政治體制？其活力、多樣性和腐敗是如何產生的？

諸如此類的問題在全書的其他章節中也有體現，但是並不影響這本著作成為當代中國問題研究中的經典之一。在建設小康社會和推進國家民主現代化進程中，尤其需要

對政治現象和政治生活作出科學、合理的分析。遑譯李侃如的這本著作，或許能夠讓我們清醒地意識到中國政治和公共行政研究的「身份危機」，促使新生代的學界同仁借用鄰壁之光，加足馬力，下沉研究重心，以實事求是和嚴謹開放的心態，以敢於擔當和銳意進取的精神，探尋中國政治發展的動力學和規律性問題，從而為在二十一世紀中期成功地建構起一個獨特的、極富生命力的、穩定與和平的體制，完成自1840年以來中國人夢寐以求的復興之願，作出應有的貢獻。

#### 註釋

- ① 伊斯頓 (David Easton) 著，王浦劬譯：《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
- ② 周飛舟：〈錦標賽體制〉，《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3期，頁54-77。
- ③ 馬斯金 (Eric S. Maskin)、許成鋼著，王信譯：〈軟預算約束理論：從中央計劃到市場〉，《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0年第4期，頁59-70。
- ④ 朱光磊、張志紅：〈「職責同構」批判〉，《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頁101-12。
- ⑤⑥ 〈代序〉，載福山 (Francis Fukuyama) 著，黃勝強、許銘原譯：《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1；3。
- ⑦ 劉擎：〈歷史終結論面對的中國模式〉，《東方早報》，2009年9月21日。
- ⑧ 王紹光：〈中國公共政策議程設置的模式〉，《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頁99。

作者對一些關鍵問題的解釋明顯不夠，在具有開創性的觀點提煉方面隨意性較強。例如，在談到經濟改革所帶來的後果和影響時，他認為中國目前「發展了一種『談判』經濟」，但這樣的論斷從何而來？其演變是否具有階段性？影響又如何？

楊志軍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